

轻柳细丝起邦壤

考古证实,形成于距今5万多年前的第四纪晚更新世黄土高原的马兰黄土中有柳树花粉的发现。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有“柳”的形象文字。文献中最早记载柳树的是《夏小正》:“正月柳穉。穉也者,发孚也。”明确提出种植柳树的是周朝时期的文献《古微书·礼纬·稽命征》。《周礼·地官·大司徒》论述“土宜之法”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之载,文中“膏物”就是杨柳类植物的泛称。《诗·国风·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之诗句,是用柳枝围成篱笆。《战国策·魏二》记述了杨柳的插木育苗:“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古代人杨柳不分,互为名称。春秋时辅助越王勾践的范蠡,在灭吴后定居陶(今山东定陶县),号“陶朱公”,后世有《陶朱公书》传世。北魏《齐民要术》曾征引此古籍《陶朱公书》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应该说是经营柳树薪炭林的最早实践。

秦汉时期植柳得到了很大发展,柳树被引植到皇家宫廷苑囿中。《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上林苑种大柳”。《西京杂记》载汉梁孝王建有忘忧之馆,并在其旁种植柳树,西汉著名赋家枚乘作《柳赋》加以称颂。《三辅黄图》记载西安霸水两岸广植有柳树,其说“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其成为后世“折柳”之风俗的来源。

魏晋六朝时期史籍中多有植柳的记载。

隋唐及至近现代,植柳极其广泛普遍。宋人李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韩琦传》《榆林府志》等史书中都有关于大规模植柳的记述。

园林植柳最早是在汉代,《西京赋》称汉武帝建上林苑植柳,《南史·张绪传》载梁武帝在芳林苑中植柳。南朝陈后主在南京宫苑台城中植柳,名台城柳。唐时于皇家园林曲江园植有大片柳树。《唐书·王维传》载唐诗人王维晚年在蓝田建私人园林“辋川别业”,园中植柳造景,有“柳浪”景点。自隋炀帝临幸扬州广植柳树后,扬州园林植柳成风,唐代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的“暖日凝花柳,春风三管弦”就是称颂当时园林植柳之况的。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载北宋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在蜀冈大明寺平山堂前植柳造景;欧阳修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时,疏浚治理西湖广植柳树,建有双柳堂。

明清时期园林植柳最为常见,最为著名的是扬州园林,人们多以“绿杨城郭”来概括明清扬州园林的柳景特色。在北京地区也是如此,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对明代北京园林中植柳造景有极为详细的记载。清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北海等都植有数量较大的柳树为景,圆明园中还有“柳浪闻莺”“深柳读书堂”景点。大明湖是济南著名园林,以植柳而名,自清留存至今的铁公祠大门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是对其的高度概括。清代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称其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清代诗人王允棫《北湖泛舟》有“千条杨柳数声鸥”诗句称道其园林柳景。

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历代植柳经验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书载:“种柳,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长一尺半,烧下头二三寸,埋之令没,常足水以浇之。必数条俱生,留一根茂者,余悉掐去。别竖一柱以为依主,每一尺,以长绳柱栏之。若不栏,必为风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余,其旁生枝叶即掐去,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书中还记载了种植柳树林的持续经营方法。

春风杨柳万古情

杨之华

护堤造景有柳溪

宋代李好古咏:“清淮北去,千里扬州路。过却瓜州杨柳树,烟水重重无数。”植柳之风,不仅弥漫了一座城,而且延伸到一条路,一片广大的区域。

种植行道树在周朝时就成为一种专门制度。最早植柳树为行道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宋代也大规模植柳作行道树。直至清代,行道树仍是柳树,近人尚秉和对清代行道植柳有这样的记述,曰:“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余幼时,自正定应举赴京师,行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幂地,羣驴而行,可数百里不见烈日。柳荫下卖茶卖酒、卖饼饵者,络绎不绝。疲则息,热则乘凉,渴饮饥食,唯所欲,虽远行而有闲适之趣。”

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有提倡在河堤植柳来固堤并保持水土的论述,最早记载河堤植柳是《管子·度地》。秦汉时期在灞水两岸种植柳树,但大规模的河堤植柳则是隋朝以后。宋代重视护堤林的营造。宋元祐中(1086—1093年)苏轼出知杭州,于西湖“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时人称为“苏公堤”。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治黄专家刘天和发明了固护堤岸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等,他在其著作《问水集》称嘉靖十四年(1535年)治理黄河在河堤“植柳二百八十万株”。

说到此,就不得不说说太原的柳溪街,其名得自宋时的柳溪。柳溪何也?《宋史·陈尧佐传》载北宋陈尧佐出知并州,治理汾河水患,筑堤植柳数万本,民赖其利。《读史方輿记要·溪·阳曲县》亦载:“柳溪,在县西一方,汾堤之东,引汾水注之,周四五里。中洲有枕华堂,宋相韩绛、韩缜兄弟相继帅太原所作,有李清臣碑。堂后通芙蓉洲,有宋王拱辰《芙蓉洲记》。汾堤之上有彤霞阁,武学贡士武经尝拟王勃《滕王阁序》为之记,并人颇传之。阁西有安武堂,下临汾野,每春秋仲月,大阅武于此。阁东有大池,池南有四照亭,北有瑞莲堂。次东有水心亭,乃岁之上巳,张水嬉游竞渡夺标之戏,太守泛舟溪中,都人仕女游观。达四旁植柳万株,清阴交合,为西北之荣观。久为汾水圯坏,今俱废。”说的是汾水东堤建柳溪,植柳万株,中有亭、阁、池、堂,可供百姓观赏游玩。

东风吹弄柳枝词

柳树因其具治病、却鬼、驱邪避毒的功用,被古人视为吉祥的象征而加以崇拜,民间形成了戴柳、插柳、射柳的习俗。古人善用谐音表达情感,“柳”与“留”、“丝”与“思”相谐,也因此产生了折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

柳树是我国的乡土树种,其飘逸的姿态、翠绿的姿色极具风流,惹得多少文人墨客竞相吟咏。“春风杨柳万千条”,柳作为文学形象出现是在先秦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之句,西汉枚乘《忘忧馆柳赋》是第一篇柳赋。魏晋六朝时期伴随着咏物诗的产生,出现了以柳为题材的咏柳诗,梁简文帝《折杨柳》则是第一篇咏柳诗。纵观历代咏柳诗文,则以唐朝贺知章的《咏柳》诗最著名、最传神:“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而“杨柳枝”“柳枝词”“杨柳曲”“折杨柳”“东门柳”“烟柳”“柳色”等等诸多柳诗、柳赋、柳记、柳词、柳曲,构成了文学领域丰富多彩的“柳文化”。

唐代以后,诗咏折柳极为兴盛,王之涣《送别》有“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诗句;孟郊《古离别》有“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李白《劳劳亭》有“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白居易《青门柳》也有“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许浑《重别》有“留却一枝河畔柳,明朝犹有远行人”;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有“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施肩吾《折柳枝》有“伤见路边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欧阳修《咏柳》有“长亭送客兼迎雨,费尽春条赠别离”;周邦彦《六丑》词有“长条故意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明·晏铎《咏柳》有“河桥杨柳半无枝,多为行人赠别离”,等等,不胜枚举。也因此,古代诗文中还出现了“折柳寄远”的亚意象符号意义。如唐代许景先《折柳篇》诗有“折芳远寄相思曲,为惜容华难再持”;卢照邻《折杨柳》诗有“攀折将安寄,军中音信稀”;张九龄《折杨柳》诗有“纤纤折杨柳,持取寄情人”;张旭《柳》诗有“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李贺《致酒行》诗有“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唐彦谦《柳》诗有“春思春愁一万枝,远村遥岸寄相思”,等等,都是诗咏折柳寄远的事象,借此以表达对远方亲友的思念。

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就收录了7篇咏柳专章,散见在其他篇章中的咏柳句子就更多了。魏文帝曹丕,西晋文学家、思想家傅玄皆作有《柳赋》。

历代文人爱柳者众多,他们除了咏柳颂柳外,还常常给自己取上一个与柳相关的名字或雅号。例如春秋时期的柳下惠,本来他并不姓柳,因为自己特别爱柳才改了姓氏,其后代也就都姓柳了。东晋的陶渊明在其隐居之宅边植柳五株,自号“五柳先生”。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在居所附近的泉边栽柳,便自居“柳泉居士”。

纪实

钱三强还通过李约瑟等人做工作,打消了一部分委员担心受到美国和本国政府打击报复的顾虑,请委员们在报告书上签字。这份报告书的发表,揭露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真相,伸张了正义。

打开核大门

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和李四光一起走进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介绍原子能科学的知识。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钱三强理所当然地担起了领导核武器研究的重担。为了支援二机部开展核武器的研究,中国科学院以大局为重,把原子能所成建制地交给了二机部,不过名义上还是双重领导,叫作“出嫁不离家”。

钱三强兼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副部长等职,责任重大。他非常忙碌,住在14楼周围的人们常可以看到,清晨,一辆绿色奔驰轿车把他接走了,却很晚才晚上什么时候把他送回来。

热情、真诚的人往往没有官气和俗气。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曾经说,钱三强身上有一种“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并且有一句中肯的评论:“书生气比官僚气要好得多。”

张劲夫这样讲,大概是因为“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里往往包含着对事业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不为名利所累,不趋炎附势,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可贵品质。

的确,只要是研制核

山西教育出版社

77

边东子 著



《中关村特楼》节选

武器需要,钱三强都会直率地提出来,不管别人说三道四。他提意见从不拐弯抹角,更不会看风使舵。当他认为某些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时候,甚至会直接说:“这样搞,不要说造原子弹,就连山药蛋也造不出来!”

他的夫人何泽慧就嗔怪他“是个‘不懂政治’的科学家”。

北岳文艺出版社

77

张卫平 著



《红色银行》节选

有人说:叫兴隆银行,日益兴隆,图个吉利。另一个站起来反对说:这是新式银行,新就要有新样子!

这时坐在炕里面的一位理事说:咱们这个银行是为了抗日而建,不如就叫个抗日银行!目的明确,牌子响亮,怎么样?

大家纷纷说好,认为这个名字符合银行成立

的目的,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银行是干嘛的。

牛照芝站起来摇摇手:我说各位当家的,这个银行少白费了不少心血,他呢又在外面见过大世面,大伙不如听听少白的意见如何?

大伙就说是啊快让少白说说意见。

刘象庚看看张干丞。

张干丞也期待地看向刘象庚。

刘象庚站起来,对于名字他早就有了想法,刘象庚清清嗓子说道:

……

各位老少爷们——诸位刚才说得都有道理。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供各位当家的决断。做生意的都知道,你的货有什么用途,要卖给谁,心里门清。咱们这个银行呢,主要办在咱们兴县,生意将

来可能做到周边,咱对的主要是什么人呢?农民!老伙计们,银行成立后主要对的就是农民啊,为什么不能叫个农民银行呢?农民们听见亲切啊,知道是他们自己的银行,用的是自己的票子。再有一个,现在有阎老西儿的部队,有东北军,还有八路军,我们谁也惹不起,各位当家的,叫农民银行谁也不得罪!

……

张干丞再次看一眼刘象庚,他从今天才更进一步地理解了、认识了这个干瘦而又精明的老头儿,这是个有胆有谋、做事还细心周到的人啊。只是当时他还不知道,刘象庚与他一样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单线联系,互不知情。

小说